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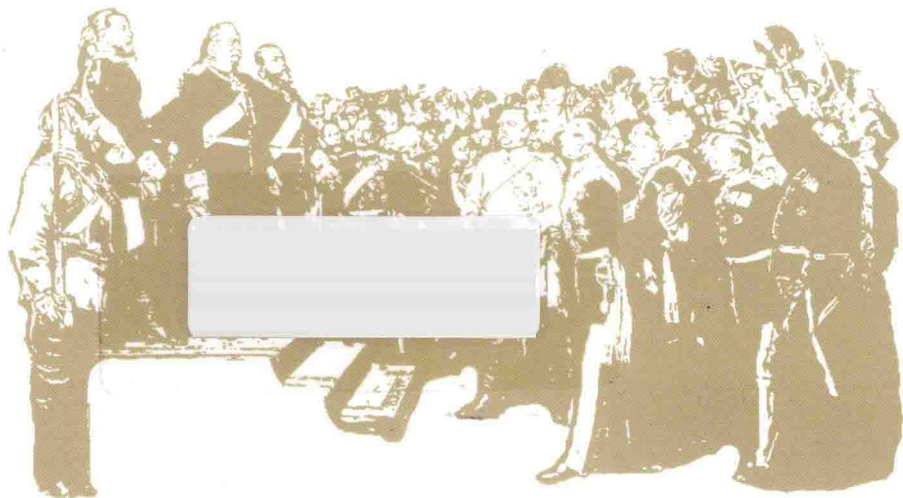
大国崛起过程中的风险与不易 认识历史和未来的新视野

脆弱的崛起

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Fragile Rise: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ate Of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4 | 修订版

徐弃郁 | 著



新华出版社

大国崛起过程中的风险与不易 认识历史和未来的新视野

脆弱的崛起

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Frangible Rise: Grand Strategy And The
Fate Of Imperial Germany 1871-1914

修订版

徐弃郁 |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徐弃郁著. —修订本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166-0982-8

I. ①脆… II. ①徐… III. ①德意志第二帝国—历史—研究 IV. ①K516.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79202 号

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作 者：徐弃郁

出 版 人：张百新

封面设计：燕清创意

责任编辑：张 程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2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一版

印 次：201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982-8

定 价：49.8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010-63077101

前 言

从大战略角度写一段历史的想法由来已久。而这段历史恰好是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崛起的开始与结束。

作为一名现实战略问题的研究员，花大力气研究这样一个遥远的话题纯属机缘巧合。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这段历史越来越感兴趣，同时发现自己的很多相关知识非常靠不住，甚至可以说是可笑的。当时政治家（思想家）出于现实需要而做出了一些“权威”论断，但后人却把它们当作事实和真理接受下来，慢慢成了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東西。而主要发源于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则希望用某些高度简化的理论模式将现实框起来，结果往往似是而非。因此，研究历史的过程与其说是证明，不如说是不断颠覆头脑中一些已经成型的观点，甚至是思维模式。

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或者称威廉德国）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值得研究。不像后来纳粹德国那样经过极端意识形态自下而上，然后再自上而下的整肃，威廉德国在社会生活领域比较包容，政治体制方面又充满矛盾。它是一个飞速崛起的大国，但安全环境十分复杂而脆弱。物质上在高歌猛进，精神方面却日趋急躁和浅薄，即使是它的知识界也在国家发展带来的亢奋中走向非理性，从而使得群众性的非理性也带上了一层科学合理的色彩。如果说人性的弱点也是国家的弱点，那么威廉德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大国崛起的各个案例中，威廉德国作为一个失败的经典案例，更是值得后人回味和思考。

我最终选择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威廉德国的崛起与失败，一方面是为了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一条线索，好让自己不至于迷失其中，另一方

||| 脆弱的崛起

面也是为了从一个更深的层面解决我实际工作中日积月累下来的一些困惑。比如国际冲突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一场冲突，特别是大国间的摊牌是否“必然”会发生？是否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决定”了它们的发生“不可避免”？这涉及哲学，也涉及人对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很多人同时承认偶然性和必然性，不过偶然性总是让人感到不踏实，所以不断被降到必然性的从属地位，算是一种“例外”。事实上，“历史规律”还是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下了充足的空隙，偶然性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而大战略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顺应“规律”，同时尽可能地利用“历史的空隙”。在威廉德国，俾斯麦深刻理解这一点，并且随时准备接受一种不完善的，甚至是不确定的结果。但他的继任者却正好相反，事事追求确定性，同时又过于强调必然性。这种哲学层面的差异是俾斯麦下台后德国的大战略迅速瓦解的重要因素。而到了后期，德国领导人对必然性的强调更是发展到了一种偏执，越来越坚信大战“不可避免”，而一系列为“不可避免”做的准备又使得大战真的“不可避免”。

从大战略角度研究一战前的德国还涉及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早在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考虑将来而等待时机，被看做是懦夫的别名……凡是主张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工作后，我有了很多与国内外官员和学者打交道的机会，发现这句话今天在很多国家还是不断被验证。而在一战前的德国，这种非理性因素对政策和大战略的冲击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来高涨的、好战的国内舆论压力，德国一些政策也许不至于如此不靠谱，可能也不至于这么轻易就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这种群众性的非理性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国家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高涨的公众舆论往往都有一种“强硬偏好”？是否可能控制这种非理性因素？这些问题构成了我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在本书中除了第五章对此进行专门分析以外，其他章节的分析也都或多或少涉及这些关键“内因”。

研究过程中，接触大量一手资料对于我这个非历史专业出身的人来说是一件新鲜有趣的事，感触自然很深。比如像俾斯麦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在

给德国驻外大使的信、在外交信件上的批示和撰写的备忘录中，展现了一种极其深邃而又宏大的战略设计，而对实现途径的筹划又是高度辩证、高度灵活的。在这些文件中，对每个细节的关注和对全局的把握非常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贯穿于其中的则是对人性本身的深刻洞察力。但是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文件则远远达不到这种水平，对形势的判断往往流于一厢情愿，战略思维（包括行文）也越来越程式化，有时其错误之明显、逻辑之僵化，令读者不禁扼腕。相形之下，英国却不存在这种明显的差距。当时英国的高级官员中没有像俾斯麦那样大师级的人物，但整体水平相当之高，可以说随便一份篇幅略长的外交文件都是不错的战略分析文章，首尾文气贯通，分析精辟入理，有些甚至完全可以作为今天撰写战略咨询报告的范文。这种差异当然也反映出了英德两国在大战略方面的差距。问题是，为什么英国能够培养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可延续的团队，而德国却做不到？已故的南京大学王绳祖先生曾经用“外交特性”一词来总结一个国家，而大英帝国的特性就是“狮子加狐狸”，那么它是如何在好几代人的时间内保持这一点的？有人可能喜欢强调机制的作用，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文化和传统也应该受到关注。那是通过长期的磨炼、教育和帮、带、实践渗入到人思维和行事习惯中的，其力量可能比有形的机制更强大，更持久。探讨这些当然不是这本书的任务，但其中的思考却一直伴随着我研究和撰写的整个过程。

付梓之际，我衷心感谢一直支持和帮助我的师长朋友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给予我这个后生小辈巨大支持，没有这些，这本书的完成可能会变得遥遥无期；我的老领导、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海军少将和我的博士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周荣耀教授在撰写过程中给了我很大帮助；原外交学会会长、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大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院长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提出了宝贵意见，给我以莫大鼓励。原瑞典国防学院院长 Karlis Neretnieks 退役少将为我提供了很多重要资料和建议，联邦德国国防军 Olaf Wiedenfeld 中校在德语文献翻译方面给予了巨大帮助，在此一并感谢。最后，对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为本

||| 脆弱的崛起

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必须承认，作为一名主要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战略研究人员，我缺乏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在驾驭浩瀚的资料方面有点力不从心。还有，我的德语是为了研究这段历史而自学的，水平十分有限。很多资料完全是凭着一股蛮劲看下来、译下来的，尽管后来得到一些朋友的大力帮助，但错误肯定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2011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低姿态的崛起	(1)
新帝国的脆弱性	(2)
强大带来的危险及其应对	(9)
“战争在望”危机	(15)
增加的国际义务——近东危机与德国的选择	(24)
第二章 “主动塑造”与大战略的构筑	(36)
大思路的设计——基辛根口述备忘录	(36)
俾斯麦结盟的开始	(40)
结盟的扩展	(49)
德国的政策与英法关系破裂	(55)
外交的支撑与补足——军队和军事战略	(62)
第三章 维持大战略的努力	(74)
社会潮流的冲击	(74)
俾斯麦的海外殖民	(81)
保加利亚危机	(88)
德俄“再保险”条约与两次地中海协定	(96)
俾斯麦时期德国大战略的简短评价	(103)
第四章 “后俾斯麦时代”的开始	(108)
外交“新路线”	(108)

||| 脆弱的崛起

“新路线”的后果	(117)
“新路线”的终结与“大陆联盟”幻想	(128)
“克鲁格电报”事件	(136)
第五章 体制、社会、民意与大战略	(145)
决策体制的制约	(145)
社会变迁与“卡特化”结构	(152)
民意的冲击	(162)
第六章 从“世界政策”到“被包围”	(175)
“世界政策”的开始	(175)
外交上的中间路线 1897—1904	(182)
从英法协约到阿尔黑西拉斯会议	(196)
英俄协约与德国“被包围”	(206)
第七章 海权偏执	(215)
德国“大海军”建设的源起与理论	(216)
第一、二次海军法案及其影响	(229)
“无畏舰竞赛”与英德海军竞赛的全面展开	(237)
“蒂尔皮茨计划”的最后阶段	(246)
第八章 大战略的退出——“施利芬计划”	(256)
“施利芬计划”的形成	(256)
“施利芬计划”的问题及其战略含义	(267)
“施利芬计划”与德国军事思维的偏执化	(278)
第九章 通向世界大战的危机处理 1908—1914	(291)
波斯尼亚危机及其后果	(292)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	(303)
七月危机与大战爆发	(314)

第一章 低姿态的崛起

强者必遭嫉妒。

——俾斯麦

1871年1月18日，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告成立。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场地缘政治版图的革命：原本破碎的心脏地带被整合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使其由一个承受四方压力、列强争衡的场所，变为向四周扩展影响的重要权力中心。近两百年来，一直是法国在不断地努力，以获取欧洲大陆的霸权，而此时这一进程彻底结束了。用当时的一句妙语来说，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①

对于德国来说，统一是它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明确标志，同时也是它承受各种新的压力与义务的开始。很快，德国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著名悖论：实力越是增加，其他大国就越是疑惧，它的外部安全压力反而不断增加。为了应对这种强大带来的风险，统一之初的德国试图放低姿态，采取一条类似“韬光养晦”的路线。如果从大战略的角度来考察，这可以看成是一个摸索时期。

^① [美]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陈景彪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

新帝国的脆弱性

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个德国基本上就是普鲁士王国的扩大。但两者在实力上却不可同日而语：普鲁士只是个军事强国，但德国却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足以引起周围国家不安的大国。统一以后，它的面积增加了近一倍，人口也从1930万增加到3460万。^①更重要的是，统一促进了经济的惊人发展，一位历史学家指出：“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②

然而这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又有非常矛盾和脆弱的一面，尤其是在内部结构上，使得德国在形成大战略，或者是任何全局性的筹划方面都十分困难。这些突出表现在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战略决策体制三个方面。

一、政治结构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完全是妥协与平衡的结果。这种妥协既体现在自由主义和君权思想之间，也体现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要求和各邦分立的传统之间。因此，统一后的德国虽然有了一部宪法，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宪政国家，其政治体制基本上属于“混合型”：既是君主制与民主代议制的混合，同时也是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的混合。

帝国国会（Reichstag）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实行普遍、平等、直接选举的帝国国会选举法被写入帝国宪法，成为德国统一在法律上的象征，是资产阶级自由

① [美] 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②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主义与俾斯麦政治合作的重要成果。帝国国会拥有 397 名法定议员，由全德 25 岁以上男子普选产生，其主要权力在于批准包括军事预算在内的各种法令。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德国成为一个真正近代化的代议制国家。与英、法等西欧国家相比，德国的国会权力要有限得多。它可以决定是否通过某项法令或财政预算，但本身却没有立法权，也不能对政府提出不信任。作为政府首脑的帝国宰相名义上向国会负责，但实际上是向皇帝负责，因为皇帝决定其去留。此外，各邦君主的代表还组成联邦参议院（Bundesrat），负责立法，从而又分去了帝国国会的部分权力。

相形之下，德意志帝国对于传统的君主权力却作了最大限度的保留。君主与代议机构——帝国国会和各邦议会的关系是按立宪君主制的原则决定的，即君主是唯一的主权代表，拥有充分的统治权，特别是在军事、对外政策等领域，君主拥有一人专断的权力。军事上，皇帝沿袭了普鲁士那种“士兵国王”的传统，军队只效忠皇帝而不效忠政府，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君主。在外交方面，除部分有关贸易、交通、关税等国际条约需要帝国国会同意外，其他国际条约（特别是同盟条约与和约）只需皇帝一人批准。在宣战问题上，只要帝国本土未遭直接攻击，皇帝只需取得联邦参议院同意就可以宣战，而不需要经过帝国国会的批准。事实上，在 1914 年 8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皇威廉二世甚至没有获得联邦参议院同意就宣战了，联邦参议院事后追加了同意，这才使宣战行为合法化。

从帝国与各邦的关系上，德国则是一种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的混合体。一方面，德意志帝国包含的统一因素并不多，表现为一种松散的联邦制。比如从主权上看，各邦君主是国家主权的共同享有者，仅仅在国际交往中皇帝才是德国唯一的主权代表。这一点在皇帝称号的确定上就可看出。1871 年帝国成立时威廉一世试图使用“德国的皇帝”（Kaiser von Deutschland）这一称号，但由于其含有对其他各邦拥有主权的意思而被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国王拒绝，最终改为只具有民族意义的称号——“德意

||| 脆弱的崛起

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① 在军队构成上，德国最重要的军种就是陆军，而陆军是由几个主要邦的陆军凑起来的，平时主要向各邦的君主负责，战时才形成统一的德国陆军并由皇帝行使指挥权。一些重要的军事机关也属于邦，比如一些书上提到的所谓德国总参谋部，实际上它真正的名称是普鲁士总参谋部。从机构和位置设立上看，只有帝国国会和宰相是代表帝国层面的。帝国不设各部，而是由宰相的办公室负责帝国具体的行政事务，直到 1878 年宰相办公室才进行扩大，分出 8 个“帝国办公厅”，分别负责外交、财政、内务、海军、邮电、铁路、司法和阿尔萨斯—洛林事务，其负责人称为“国务秘书”（Staatssekretär）。^② 所以德意志帝国不存在部长，除宰相以外也不存在别的帝国大臣。另一方面，德国又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这主要是因为普鲁士邦在帝国事务中起着过于重要的作用，比如它拥有帝国 2/3 的土地和 3/5 的人口，德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基地都在其境内。而且，帝国税收与各邦的税收分开，普鲁士邦的税收收入长期高于帝国的岁入。到 1913 年时，普鲁士的总岁入仍比帝国总岁入高约 1.2 亿马克。^③ 更重要的是，普鲁士在政治决策中占有极特殊的位置，其国王就是德国皇帝，而帝国宰相除 1873 年和 1892—1894 年两次短暂的中断外，一般都兼任普鲁士首相，在由各邦代表组成的帝国立法机构——联邦参议院中，普鲁士占了 58 个议席中的 17 席，足以否决任何它不同意的提案。可以说，谁掌握了普鲁士，谁就能掌握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命运。

二、社会结构

统一以后的德国国内社会也是一种充满矛盾和各种张力的结构，其主

① [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范德一等译），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222 页。

② D. G. Williamson, *Bismarck and Germany 1862—1890* (seco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8, p. 45.

③ [联邦德国] 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张载扬等译），第三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 年版，第 276—277 页；[美] 科佩尔·S. 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它的历史和文化》，上册，第 221 页。

要矛盾包括德意志传统的分立主义和统一国家之间的矛盾，及与社会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之间几乎是势均力敌的对立。

在刚刚完成统一的时候，第一类矛盾表现得十分突出。由于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用武力来强制实现的，普鲁士与原先敌对各邦（如汉诺威、萨克森等）之间就存在着战胜者与失败者的裂痕。而且，在德意志历史上，以王朝为基础的分立主义根深蒂固，对王朝的忠诚一直是比民族认同更为牢固的纽带。对此，俾斯麦在其《思考与回忆》一书中指出：“在王朝的家庭统治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特殊的民族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包含各种不同成分，它们的组合既不是以族的相同也不是历史发展的相同为基础，而完全是以这样一种大可争议的事实为基础：即由王朝借助亲属关系、共同继承关系或在选举皇帝时从皇室获取继承权等来达到加强和继承的权利。无论这种小邦分立的组合的起源是什么，它的后果总是：各个德意志人随时准备用火与剑同自己的德意志邻居和同族人搏斗，如果发生连他本人也不理解的纠纷，只要王朝有令，就亲自把对方置于死地。”^①这种分立主义还涉及波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问题。统一的德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其基础是民族认同，而不是对王朝的效忠。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生活在德国土地上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居住在德国东部的波兰人该如何定位？历史上波兰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并入普鲁士的波兰人只是效忠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仍保留着波兰人的民族独立性，因此在普鲁士统治下波兰问题并不突出。但是德国统一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建立在德意志民族基础上的国家形式反过来也刺激了波兰人的民族意识，很多波兰贵族宣称他们可以成为普鲁士人，但绝不会成为德国人。^②

与民族问题相混杂的还有宗教问题。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德意志境内就存在着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给德意志带来巨大灾难的“三十

^① [德] 奥托·冯·俾斯麦：《思考与回忆》（山西大学外语系《思考与回忆》翻译组译），第一卷，北京：东方出版社1985年版，第237页。

^② Imanuel Geiss, *German Foreign Policy 1871 - 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6, p. 5.

脆弱崛起

年战争”部分原因就来自这种宗教矛盾。德国统一并没有使宗教问题消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有所复活。当时在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的民众中间，1871年的胜利和帝国的建立被看做是路德的新教对（不仅是法国的）天主教的胜利。^①然而新教虽然在全德范围获得了主导地位，但在德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却是天主教占优势。这些天主教占优势的地区（如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和以新教为主的普鲁士之间存在的分离倾向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传统的宗教原因。另外，波兰人也主要信仰天主教，与德国的新教基础不断产生矛盾。在德国决策层，特别是普鲁士政府看来，确保新教的主导地位对于维护德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是至关重要的。在1906年，德国宰相毕洛夫就十分担心，一旦奥匈帝国解体，其德语地区（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并入德国将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将因此增加1500万天主教徒，新教徒将由此成为少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与三十年战争之前的比例类似。这将导致德意志帝国分崩离析。”^②

第二类矛盾主要存在于社会阶层之间。传统的德国社会基本上以农业为主，掌握土地的容克地主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是政府官员，特别是陆军军官的主要来源。然而到德国统一时，工业化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在1850—1854年，德国45.2%的国内净产值来自农业、林业和渔业，20.4%来自工业和手工业，到1870—1874年时，两者成为37.9%和29.7%。^③这样，传统的国内权力结构就不断背离新的经济基础，迅速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开

① [联邦德国] 卡尔·艾利希·博恩等著：《德意志史》，第三卷（下），第668—669页。

② 毕洛夫致斯坦伯格，1905年4月14日，Johannes Lepsius, 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 Friedrich Thimme (ed.), *Die groß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Sammlung der Diplomatischen Akten des Auswärtigen Amtes*, Berli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 für Politik und Geschichte, 1925—1927 (1871—1914年欧洲各内阁重大政策：外交部外交文件集)，柏林1925—1927年出版，以下本书均简称为*Die große Politik*), vol. 19, part II, pp. 598—599。

③ Otto Pflanze, *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 vol. 3,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2.

始积极要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权力。然而，新的德意志帝国是由普鲁士的封建贵族为主导而建立的，容克地主阶层仍可以凭借有利的社会地位坚持原有的权力分配。而且，德国的统一时间相对较短，工业化过程又十分集中，因此德国不像工业化过程相对漫长的英、法等国那样有足够的时间扫除传统的精英阶层，或是将其吸纳到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在工业社会中保留了由封建—军事精英组成的权力“硬核”。^①这就造成德国独特的社会现象，即同时存在工商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两个势均力敌的利益集团，双方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对政府发挥影响，由此产生的二元张力是刚统一不久德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统一日益巩固，德国国内的第一类矛盾有所下降，而第二类矛盾却不断突出。特别是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矛盾的主体进一步增加，局面也更加复杂化。

三、战略决策体制

德国的战略决策体制主要可以从外交和军事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德意志帝国政府的代表是宰相，向皇帝负责，主持处理日常的政治事务，外交也由宰相负责。1878年之前，帝国宰相办公室负责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德国驻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构均直接向俾斯麦本人负责。到1878年宰相办公室扩大后，设立“外交办公厅”，其长官称为“外交国务秘书”（Der Staatssekretär des Auswärtigen Amtes），类似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但权力要小，实际上是协助宰相处理外交事务。德国当时外交政策制定的基本流程是：使馆搜集外交信息，由外交办公厅汇集各方面信息并呈报宰相，宰相形成判断并主导制定政策，皇帝进行最后裁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则由宰相下达具体指令，驻外外交官员负责执行，或是由宰相亲自出面直接与其他国家驻德使节进行沟通。

但在现实中，这种程序往往被打破。由于当时德国的外交官都出身贵

^① Ralf Dahrendorf, *Gesellschaft und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 München: Piper & Co. Verlag, 1965 (《德国的社会与民主》，慕尼黑1965年版)，pp. 43—59.

脆弱崛起

族，因此有些情况下外交官也会利用与王室之间的特殊关系直接向皇帝报告，从而引起宰相与外交官之间的冲突。统一之初，德国驻法大使阿尼姆伯爵不同意俾斯麦的对法政策，主张德国应帮助稳定法国国内政局，并使其重新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而俾斯麦认为，法国的共和制与动荡的政局对德国有利，因为这些是阻止法国与俄国结盟的主要障碍，而一个君主制的、稳定的法国则会成为沙皇俄国“可能的、合适的盟友”。^①阿尼姆遭到俾斯麦驳斥后并没有服从，而是干脆绕过俾斯麦直接向威廉一世皇帝写信，这就严重破坏了宰相对外交事务的统一领导。俾斯麦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两人的冲突最终以阿尼姆被解除大使职务并以“处理公务文件不当”的罪名受到法律制裁而结束。从“阿尼姆事件”以后，德国在外交方面的决策完全集中到作为宰相的俾斯麦手中，只要皇帝不进行硬性干预的话，外交政策就完全按照他的思路来进行。

但是在军事领域，宰相的权力却极小。德国的军事制度基本上是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延伸，是在绝对王权体制下形成的、被小心保存下来以免受文官和代议机构染指的一整套设计。德国实行军政和军令分开的制度，普鲁士陆军部主要负责全德军事行政方面工作（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除外），另外宰相在其中也可以发挥一点象征性的作用，如在国防预算、兵员补充、装备、军需等方面需要他副署以赞同皇帝意见。但在军令方面，如军事计划、军队的组织训练、动员和使用等，则完全由皇帝一人专断。普鲁士总参谋部在其中也有很大权力，平时负责制订作战计划，战时负责具体落实和执行皇帝的命令，实际上是整个德国军队的总参谋部。此外，还有几个由一小部分陆海军将领组成的“军事内阁”每天向皇帝作出报告，就军事问题进行讨论决策，实际组成了一个与普鲁士陆军部、总参谋部平行的、只向皇帝负责的军官集团。这三个主要军事决策机构之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联系，全德国的武装力量也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军队（主要是普鲁士军队）在德国的战略决策

^① Gordon A. Craig, *Germany 1866—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03—105.